



用热血显影的抗战历史



1936年12月,晋绥军开赴绥远抗战前线,绥远抗战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。方大曾/摄



1944年,八路军冀中子弟兵进行操练。石少华/摄

本报记者 郑萍萍 撰文

78年前的7月7日,日本驻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,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(今卢沟桥镇)搜查。中国驻军严词拒绝后,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起了进攻。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,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

“这次抗战,其悲壮惨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。”3天后,到达“七七事变”现场的方大曾在《卢沟桥抗战记》中写到。根据《方大曾:消失与重现》一书记述,1937年7月10日,在家休假的方大曾得知卢沟桥发生战事,便骑自

行车赶到宛平城,看到人们正在掩埋阵亡将士,童子军向商户募捐。他拍下了很多照片,于当晚离开宛平城返回北京开始写作。8月1日,上海《世界知识》发表了这篇名为《卢沟桥抗战记》的报道,方大曾也成为报道“卢沟桥事变”的第一人。

方大曾1912年出生在北京,家境殷实。他从小喜爱摄影,读小学时,母亲用7块大洋给他买了第一台相机。十六岁时,他在报纸上号召有相机的有志青年,拿起相机一起去发现生活的乐趣。大学毕业后,受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,他参与创办了“中外新闻学社”,并以“小方”的笔名在各报刊发表照片和文字报道。1936年12月,绥远抗战一开始,他就拿起相机奔赴前线。在北京、集宁、高家地、红格尔图、陶林等地的43天里,他几乎孤身奔波于各战场间,留下了大量影像资料。

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经范长江介绍,方大曾成为《大公报》的战地特派员,奔赴河北、山西等地采访。1937年9月,方大曾从河北藁城县寄出最后一篇报道后便突然失踪。9月30日,《大公报》刊登了这篇署名“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”的文章《平汉线北段的变化》:“九月十三日,敌军即已有小部渡河。十四日战争最烈,对方的炮火机关枪还要密,我们只用守据点的死法子……”据《方大曾:消失与重现》的作者冯雪松推测,方大曾应该是在保定沦陷时牺牲。

这一年,方大曾25岁,年华正好;这一年,同样25岁的沙飞,也毅然奔赴华北抗战前线。

沙飞本名司徒传,出生于广州。从无线电学校毕业后,便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。1930年代初,沙飞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以摄影为终身事业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从艺术摄影转而关注社会题材的沙飞在《广西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“摄影与救亡”的短文,他坚信:摄影是“宣传国家正在面临着战争悲剧的最强大的武器”。而早在1931年,日本人侵东三省后,大量爱国的摄影人,就通过摄影展览宣传抗日活动。

1937年12月,沙飞在河北参加了八路军,并于1942年参与创办了第一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画报《晋察冀画报》。在美国学者何咏思看来,正是沙飞塑造了《晋察冀画报》作为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官方通讯社的品质。在创刊号,聂荣臻题词:“它告诉了全国同胞,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;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,他们在东方,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!”在94页的创刊号上,共发表了沙飞、罗光达等人的新闻摄影照片150余幅。

次年,他年仅20岁的老乡石少华,带着相机和50多个胶卷,秘密北上延安。从陕北公学毕业后,石少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(抗大)继续学习,成为一名摄影记者。沙飞、石少华彼此慕名已久,却直到1940年的冬天才第一次见面。那晚,两人彻夜详谈。

沙飞粗犷率性,石少华则细致有谋略。此后,两人一起办刊,并肩负生命保护记录历史的底片。面对人手紧缺,石少华提议开办摄影干部训练班。这是最艰苦的一段日子,敌人全线封锁。上课的时候,没有胶卷,也没有照相机,他们就用香在火柴盒上烫一个洞,把晒晒纸贴在火柴盒的后面,放上两个砖头,进行曝光。从1940年6月到1948年11月,9期培训班培养了200多名学员。

沙飞、石少华和他们的战友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战地影像。通过这些影像,人们看到,共产党领导人朴素而易近人的姿态,人民军队顽强而乐观的精神,根据地群众艰苦而热情的生活。这些影像传播到游击区、沦陷区以及海外,为抗战胜利赢得了反法西斯盟友和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。其中,沙飞在1937年拍摄的《战斗在古长城上》被视作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经典缩影。尽管日后受到“摆拍”的质疑,但这张照片,被印刷到无数的传单与海报上,激励了爱国民众,投入到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。

抗战爆发后,袁牧之、吴印咸、钱筱璋、徐肖冰等优秀电影人也陆续由国统区奔赴延安。他们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下,于1938年9月初成立了延安电影团,全名为“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”。

电影团的工作条件同样非常简陋,办公地点就是几孔土窑洞。延安没有发电厂,即使夜晚也只能点小油盏灯。拍摄字幕、动画、印制影片,

印相放大照片等,都是利用照射到窑洞前的太阳光来进行。直至1946年10月撤销建制,8年里,电影团的工作者常年战斗在一线,记录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击日寇、为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场景,拍摄了《延安与八路军》《南泥湾》等重要的新闻纪录片,同时留下了上万张反映陕甘宁边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等各方面的照片。事实上,在抗战中后期,由于胶片的来源越来越困难,电影团的主要工作几乎就是拍摄照片了。

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,贺龙等视察前线、手术中的白求恩……电影团拍摄的这些照片都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,成为一代人追求理想的化身。据粗略统计,仅华北各抗日根据地,就有20余名战地摄影记者在前线牺牲,而其中大多数人的面目都已消失在历史之中。

2006年,方大曾的后人将精心保存的837张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;2011年,沙飞的后人将106张原版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;2013年,石少华的后人将60余张由石少华亲自参与制作的原版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……

78年后的7月7日,这些珍贵的影像首次在国博以“抗战与文艺”为题共同展出。在这些用热血与生命显影的影像面前,我们恐怕唯有用心“凝视”才能抵御岁月漫长。

(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)

1939年8月,八路军召开精神总动员大会。沙飞/摄



1938年春,长城插箭岭战斗,八路军指挥所。沙飞/摄



1939年,白求恩在日光浴。这年10月,他在河北来源黄土岭前线手术时,手指被划破而感染,11月12日不幸去世。沙飞/摄



1936年12月,绥远抗战前线,晋绥军机枪手。方大曾/摄



1940年3月8日,根据地妇女练习战斗,八路军指挥所。沙飞/摄



1943年春节,延安鲁艺秧歌队在边区政府门前表演《歌唱南泥湾》。徐肖冰/摄



1940年5月,人民武装自卫队。沙飞/摄



1941年,延安炼铁厂。周从初/摄



1942年9月,延安,九一运动会跳远比赛。吴印咸/摄